

## 徜徉中国宝卷的文本与田野之间

### ——俄罗斯学者白若思访谈录

采访人：姚伟

白若思 (Rostislav Berezkin)，当今世界专门从事中国宝卷研究的西方学者。1982 年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师从孟列夫 (Lev N. Menshikov, 1926~2005)、李福清 (Boris L. Riftin, 1932~2012)、梅维恒 (Victor Mair) 等西方著名汉学家，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白若思博士致力于中国宝卷研究，成果丰硕，已出版俄文研究著作《论宝卷在中国文化中的功能：基于〈目莲三世宝卷〉的考察》



(*Dragocennye svitki (Baotsiuan') v duhovnoi kul'ture Kitaia: na primere Baotsiuan' o Treh Voplosheniyah Muliania*) 和英文研究著作《多面目莲：明清时期宝卷》(*Many Faces of Mulian: The Precious Scrolls of Late Imperial China*)，并在《通报》(*T'oung Pao*)、《东方档案》(*Archiv Oriental*)、《大亚细亚》(*Asia Major*) 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宝卷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张诗洋老师曾于 2017 年 4 月对白若思博士进行过专访 (见《国际汉学》2019 年第 1 期)，主要关注其汉学研究之路及其俗文学研究思路等问题，对他有关中国宝卷的著述着墨不多。笔者利用在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契机，2019 年 12 月 17 日在复旦大学光华西楼对白若思博士进行了访谈，着重就海外宝卷研究历史与现状、宝卷研究方法、宝卷及俗文学的海外传播等话题展开了交流。

#### 一、结缘中国宝卷

访：白若思博士，作为一名来自俄罗斯的青年学者，您是如何与中国宝卷结缘的？

**白若思：**我研究中国宝卷有很大的偶然性，主要是我的俄罗斯老师孟列夫（Lev N. Menshikov）教授的建议。我本来很想做中国唐宋文学的研究，当时也关注了敦煌的资料，可是孟列夫老师告诉我敦煌文献十分有限。他本人曾于20世纪80~90年代赴甘肃参加有关敦煌学的学术会议，那时就已经注意到河西地区还存在活态的宝卷，于是他带回了一些甘肃学者整理的河西宝卷集，比如《酒泉宝卷》。孟列夫老师后来将这些资料提供给我，建议我做宝卷研究。考虑到当时俄罗斯没有人专门研究中国宝卷，我就选择了这个题目。我的副博士论文就是有关《目莲三世宝卷》的研究。

**访：**对于年轻学者而言，中国宝卷的确是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我十分佩服您的勇气和毅力。据我了解，包括您在内，海外有好几位年轻博士都选择以宝卷作为学位论文题目，但多集中在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几所美国大学，您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白若思：**老师的研究兴趣是第一位的。这些学校都有从事中国民间信仰和俗文学研究的老师，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姜士彬（David Johnson）教授就是研究中国民间宗教表演仪式的专家，他对民间仪式戏的研究比较深入，有些也涉及到了宝卷。芝加哥大学的蔡九迪（Judith Zeitlin）教授是海外研究俗文学，尤其是小说、戏曲的杰出学者。我的导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Mair）教授是西方研究敦煌变文的重要学者。他在《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中也提到了河西宝卷。

除了老师资源以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大学通常都藏有中国宝卷，同时也会主动购买中国近期出版的宝卷合集，这些资料对于美国学生来说比较难买到。

**访：**提到您的导师梅维恒教授，他在您已出版的博士论文《多面目莲：明清时期的宝卷》中夸赞您“将宝卷研究带到了令人兴奋的高水平和精准度”。您怎么看待自己老师的评价？

**白若思：**梅维恒老师的评价让我很不好意思。他这样评价可能是因为国外宝卷研究者还是比较少的缘故。在论文写作中梅维恒老师的确给了我很多理论上的指导。他本人一直致力于唐代变文的研究。与很多学者不同，他特别重视研究变文与佛教信仰

以及佛教经典的关系，因为他擅于印度与西域各种语言，包括梵文、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等。他有关变文对中国后世俗文学影响的研究对我启发很大，让我认识到宝卷研究也要关注宝卷故事在评弹、戏曲、小说等其它俗文学体裁中的流变。

**访：**您能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谈谈海外学者进入中国宝卷研究领域的“门槛”吗？

**白若思：**宝卷是俗文学中异常复杂的一种。研究者不仅需要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还需要对中国宗教以及这些宗教信仰在民间的传播情况有所了解。除此之外，俗文学的知识也需要掌握，毕竟传说故事不仅出现在宝卷中，评弹、道情、传统戏曲的不同剧种里面也有很多。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由于很多宝卷文本中都存在方言，研究者也需要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我知道很多研究中国口头文学的西方学者都在学习中国的方言，如研究评话的丹麦汉学家易德波（Vibeke Børdahl）就对扬州方言有极高的造诣，而研究苏州评弹的美国学者马克·本德（Mark Bender）同样对苏州方言极为熟稔。

## 二、梳理宝卷西传的历史

**访：**说到西方中国宝卷研究者，您在北京大学刚刚做了“海外中国宝卷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讲座。据我所知，前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伊维德（Wilt L. Idema）教授2012年在《中国演唱文艺》（*CHINOPERL*）上也发表过《宝卷研究的英文文献综述》（“English-language Studies of Precious Scrolls: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一文，能谈一谈您研究的特色吗？

**白若思：**伊维德教授主要是对英语世界宝卷研究书目的整理，他的研究主要是介绍性的，且略显陈旧。比较来说，我的研究更加具体，而且在英语国家之外，我还考察了俄罗斯、法国、日本、越南等非英语国家的宝卷研究成果。为保证研究的时效性，我还特别注意搜集和整理近年来新出现的宝卷著述。

**访：**通过梳理研究历史，您对中国宝卷的早期西传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白若思：**海外的宝卷研究早在晚清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中间就已经开始了。加拿大汉学家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已提到了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的教派宝卷研究，我就不再赘述了。我重点谈谈法国传

教士禄是迢 (Henri S.J. Dore, 1859~1931) 的研究。禄是迢神父是较早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西方学者, 他用法文写了一套综合介绍江南人的习俗、民间信仰的丛书, 书名为《中国迷信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这套丛书在西方影响很大。

禄是迢的中文非常好, 更关键的是他有很多中国弟子, 他们为禄是迢提供了很多关于他们家乡习俗的资料, 这些资料主要涉及江苏、浙江、安徽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尽管禄是迢没有在书中直接提到“宝卷”、“宣卷”、“讲经”这些词语, 但是他讨论的很多信仰、仪式与宝卷讲唱习俗都有直接的关系。例如他介绍的张仙信仰就和常熟宝卷中记录的“张仙射天狗”传说密切相关。除此之外, 禄是迢还介绍了妙善公主的故事, 这也是《香山宝卷》的题材来源。尽管禄是迢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通俗小说《观音略传》, 但也注意到了《香山宝卷》。此外, 他还在书中提到了“做会”, 这种说法在长江以北的靖江就是专指讲唱宝卷的集会。

**访:** 传教士的确是最早关注中国宝卷的群体。据我所知, 已故美国汉学家韩南 (Patrick Hanan, 1927~2014) 就曾在其论文集《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 中提及德国传教士郭实猎 (Karl Gützlaff, 1803~1851) 的《香山宝卷》译介。基于对宝卷研究历史的梳理, 您觉得过去海外学者的宝卷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白若思:** 过去的海外中国宝卷研究主要以文献研究为主。早期西方宝卷研究者基于自己的研究背景和目的, 更偏重于教派宝卷的研究。欧大年教授就是代表, 他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教授时收集了很多明清时期的宝卷复印本, 并把它们介绍给西方学界。他的著作《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便是基于他所搜集的各种宝卷文本完成的。同时, 由于过去的很多宝卷研究者无缘到中国来, 他们无法对宝卷的演唱和社会功能做细致的田野调查, 只能依据文献资料进行推测, 因而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访:** 提过了法国和加拿大的宝卷研究者, 能否请您再谈谈其它国家的宝卷研究?

**白若思:** 首先, 我想谈一下俄罗斯学者的宝卷研究。司徒洛娃 (Elvira S.

Stulova, 1934~1993) 博士是俄罗斯第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宝卷的学者。她曾在北京大学留学 5 年, 回国后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今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做研究员。司徒洛娃对俄罗斯藏的几部明末清初宝卷珍本进行研究, 并用俄文翻译了 1599 年重刊本《普明如来无为了意宝卷》。除了宝卷文本研究, 司徒洛娃还曾到江苏的靖江实地考察了当地的“讲经”仪式, 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论文。

其次, 我还想谈谈日本学者的贡献。泽田瑞穗教授是日本最杰出的中国宝卷研究者。他 1963 年出版的《宝卷的研究》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的宝卷文本研究著作。泽田瑞穗教授一共搜集了 139 种宝卷文本, 他在专著中对这些文本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和分析, 对后世学者的参考意义极大。

**访:** 请您再评价一下中国学者的宝卷研究。

**白若思:** 中国学者的宝卷研究仍以文献的整理和发掘为主, 但最近也有不少实地考察宝卷演唱的研究成果出现。这些整理工作确实为海外学者的宝卷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 中国学者中从比较角度来研究宝卷的并不多, 而从宗教学角度研究宝卷的就更为稀少了, 据我所知, 仅有北京社科院马西沙老师、上海师范大学侯冲教授、人民大学曹新宇教授等少数几位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

**访:** 每个国家的宝卷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特色, 联合起来效果肯定不错。我发现您在近年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视与不同国家研究者的合作, 这是否代表了未来的宝卷研究趋势?

**白若思:** 宝卷研究本来就有国际化趋势。我的几位俄罗斯老师就曾和很多中国学者合作过。最近几年, 我与中国、越南、俄罗斯的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合作, 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其中我参加了由陕西师范大学李永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泳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的调查与跨学科研究”以及常熟理工学院有关宣卷文艺特点的教育部项目。通过这些项目我与中国学者定期见面交流, 取长补短, 受益颇丰。除此之外, 我自己还主持了一个由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会发起的支持佛教研究的项目, 主要内容是考察中国佛教故事在越南的传播和演变, 我之前有关妙善公主传说在越南的流变的讲座就是这个项目非常重要的研究个案。这个项目是跟越南汉喃研究院的专

家合作的，越南学者也在研究中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 三、引介宝卷研究的“他山之石”

**访：**和之前的研究者相比，您似乎更注重宝卷的田野调查。您有关常熟、靖江讲经的田野调查给人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也为中国宝卷和讲唱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本。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采用这一方法研究宝卷的？

**白若思：**宝卷不仅仅是一种文献，它以口头演唱的形式传播，并扮演着特殊的社会功能。在实际研究中，我基本上采取了文本与田野相结合的方法。在最开始的学术训练中，我主要使用传统的版本学研究方法，即通过文本来研究宝卷在传播中的流变，并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分析宝卷的叙述性文本与其它俗文学的关系。孟列夫教授很早就鼓励我到中国实地考察宝卷的演唱，但我当时选择先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后来在那里读了博士。

我真正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宝卷是在2008年，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我去了江苏张家港港口镇观察民间做会，不仅拍摄了影像资料，也搜集到了许多地方材料，后来我在博士论文中使用了这些材料。这里我也要感谢当地学者，特别是恬庄的虞永良先生，带我去看这种民间文艺表演现场，结识当地艺人。我在田野调查中主要关注吴语区宝卷文本在江苏南部讲经、宣卷仪式中扮演的角色，藉此考察宝卷的社会功能。

通过调查，我发现宝卷在20世纪初通过江南地区的善书局以石印的方式刊刻流传，在上海和江南的一些大城市成为一种受欢迎的读物。然而，宝卷宣讲在今天的上海已经几乎失传，而江苏的靖江、常熟、张家港、无锡、吴江等地的宣卷活动仍在进行，这些地方有适合宝卷宣讲的民间集会和庙会，甚至在私人家里举办的禳灾法会和丧事上也会宣卷。

就我看来，田野调查的方法非常重要，对于讲唱文学、地方戏、仪式戏等中国口头文学的抢救性保护非常实用。

**访：**说到田野调查，据我所知，您的老师梅维恒教授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甘肃河西地区考察敦煌变文。他接受了甘肃当地一些学者的意见，认为河西宝卷直接来自敦煌变文，然而车锡伦先生却认为，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没有直接联系，而是16~17

世纪经由内地传入河西地区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白若思：**在宝卷与变文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我同意车锡伦先生的意见。我2019年发表的论文《早期宝卷版本中的插图及“看图讲故事”的理论问题》中就特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说明。尽管郑振铎先生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宝卷是变文“嫡系子孙”的看法，但到目前为止仍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宝卷和变文有直接联系。梅维恒老师的观点是基于变文研究材料提出的，他并没有进行宝卷文本的对比研究。车锡伦先生提供了很多的证据，他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另外，最近青海师范大学刘永红老师发表的一些对西北部宝卷的田野调查成果，包括甘肃南部、青海的宝卷研究，也能证明车锡伦老师的一些观点，即大部分宝卷是在明代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的。不过，我在这方面还是缺乏很多知识的，因为基本没有专门去研究过河西宝卷。总而言之，北方的宝卷讲唱跟江南的宣卷有很多不同。这是很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已有几位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我认为宝卷与变文的关系研究应从个案出发。以“目莲故事”为例，尽管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和《目莲宝卷》都记录了这个故事，但其实他们可能没有直接的联系。通过文本比较可知，宋代的伪经《佛说目莲救母经》才是《目莲宝卷》真正的来源。这些伪经尤以藏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比较有名。通过比较就会发现，伪经和《目莲宝卷》的内容十分接近，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与《目莲宝卷》的确相去甚远。总之，与佛教经典关系紧密的几部宝卷和变文的关系会更紧密一些，但宝卷的文本内容较变文来说肯定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明显能够看出在传播过程中其它佛教文献或俗文学作品的影响。

**访：**提到《目莲宝卷》，学界对您引介的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1440年版《目莲尊者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赞誉有加。请问您是如何发现这部宝卷的？

**白若思：**《目莲尊者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的发现应该归功于我的俄罗斯老师孟列夫教授。这部宝卷原属于俄罗斯的私人收藏，因为孟列夫老师认识这个宝卷收藏者的后代，我才知道有这个版本。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后来出资购买了这部宝卷，我才一睹其真容。尽管该版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北元宣光三年（1373）残本《目莲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内容一致，但由于藏本面貌比国图的完整，且是彩图本，因此极具研究价值。据我推测，这个本子应该是供明朝宫廷皇室使用的，因为上面的题记写明了姜皇妃的名号，只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能在史传中查到这位皇妃。

**访：**除了《目莲宝卷》以外，您还介绍了现藏于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的1772年版《香山宝卷》。据我所知，这是现存的最早《香山宝卷》版本。这个版本的发现过程是怎样的？

**白若思：**1772年“越南版”《香山宝卷》的确是目下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香山宝卷》版本。这部宝卷的发现要归功于我的另一位俄罗斯老师，李福清（Boris. L. Riftin，1932~2012）院士，他在1973年就发现了这个版本。当时苏联和越南的关系非常密切，李福清老师在越南研究汉籍，意外发现了这一版本。他后来给我看了这个版本，我们合作2013年在《通报》上发表了研究这部宝卷版本特色的长篇文章，与其他现存的《香山宝卷》版本进行了比较。可惜他没能看到这篇文章出版就去世了。

在我看来，海外藏中国宝卷的考察和引介的确非常重要，不仅可以让大家了解国外的宝卷收藏情况，尤其是一些比较稀见的文本，也是海外汉学史的重要研究课题。这些宝卷的来历、传播的途径都很值得研究。很多著名汉学家都考察过汉籍的海外收藏情况，如荷兰汉学家龙彼德（Pier van der Loon，1920~2002）教授就曾在东南亚搜集俗文学文本。我和李永平教授现在正在寻找法国汉学家苏远鸣（M. Soyemie）私人收藏的几部明末清初宝卷珍本，希望最终能够将其引介回中国。

#### 四、助力中国宝卷的域外传播

**访：**我们再来谈谈宝卷的译介及海外传播情况。2008~2021年，伊维德（Wilt L. Idema）教授陆续推出了《香山宝卷》《目莲三世宝卷》《张四姐闹东京》《雷峰宝卷》《庄子蝶梦骷髅宝卷》《沉香宝卷》《瘟鼠宝卷》《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等多部宝卷英译本，另外也出了六本河西宝卷的译文合编，包括当地著名的《平天仙姑宝卷》。您为几本译作撰写了专业的书评，极大地推动了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能请您谈一谈对伊维德教授及其宝卷翻译的看法吗？

**白若思：**伊维德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他曾作为我博士论文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在我看来，伊维德教授所从事的宝卷翻译工作非常重要，他的翻译水平很高，译本在西方学术界有挺大的影响。通过他的翻译，西方不懂中文的读者也可以阅读宝卷，这样中国宝卷就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了。此外，伊维德教授的宝卷译本注释非常丰富，完全可以作为欧美国家中国文学、历史、文化专业学生的必备教材和参考资料。实际上，这种有关中国俗文学的高水平译作在西方国家实在是



不多见。总之，伊维德教授的翻译和研究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俗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为译本撰写书评的任务是受国内外期刊编辑的委托进行的，他们通常会给我寄送伊维德教授的英译本。相较于译文，我其实更关注他的研究性导论。从研究方法而言，伊维德教授也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梳理和比较包括宝卷在内的中国俗文学中著名故事的诸多版本。我的俄罗斯老师李福清院士很早就采取了这种研究方法。

我自己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也曾翻译过《目莲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目莲三世宝卷》等宝卷的部分文本。尽管我参考过伊维德教授的译文，但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我同样会选择自己动手翻译。我在俄罗斯求学时就曾用俄文翻译《目莲三世宝卷》，列入我的副博士论文附录，目前还没有正式出版。

**访：**鉴于宝卷“韵散结合”的文体特征，译者在翻译中必然会遇到如何处理韵文的问题。伊维德教授并未翻译原文的韵律，您如何看待这种“去韵化”的译法？韵律之外，什么是困扰宝卷译者的难题？

**白若思：**宝卷的韵律翻译对于译者来说的确是个难题。我的前辈司徒洛娃在翻译《普明如来无为了意宝卷》的时候也没有采取押韵的形式。对译者而言，韵律翻译难度的确很大，也不会有多少读者喜欢。我自己在翻译《目莲三世宝卷》时也出于译文准确度的考虑放弃了采取韵律翻译的形式。现代英语国家的很多诗歌也已经不押韵了，所以这种“去韵化”的宝卷译文在英语读者看来也不会觉得奇怪。

宝卷翻译的难度依文本性质而定。我翻译的《目莲三世宝卷》属于叙事性宝卷，内容不是特别复杂。司徒洛娃翻译的《普明如来无为了意宝卷》则属于教派宝卷，里面掺杂了非常多的佛教、道教术语和宗教内容，翻译难度可想而知。

**访：**我们再来谈谈宝卷的术语翻译。欧大年教授和他的学生那原道（Randall Nadeau）在研究中分别以“precious volumes”和“precious scrolls”来指代中国宝卷，您如何看待宝卷的译名之争？

**白若思：**这两种译法都是在试图对宝卷的“卷”进行解读。“卷”在中文中有很多意思，可以表示“部分”，也可以是“经卷”。从敦煌文献来看，经卷确实有“卷轴”（scroll）的含义，但如我所说，宝卷与敦煌的经卷并不一致。在我看来，这两个

术语都无法诠释中国宝卷背后的全部文化信息。我自己在研究中通常会采取“记音+注释”的方式来翻译这个术语，这样更有利于英语读者准确理解这种特殊的说唱形式。我感觉其实像宝卷、评话这样的中国口头文学形式是没办法在其它语言中找到对应的，因此“记音”译法是个不错的选择，据我所知德国俗文学的一种“民众书”(Volksbuch)在翻译中就没有变成英文或者俄文，也是保留了原音。

**访：**就您自己的出版经历来看，美国学术出版社对中国民间宗教相关研究著作或者译作的出版积极性怎样？

**白若思：**美国学术出版社还是很欢迎这类研究成果的。美国主要的大学出版社一般都有很多资助，多是来自于私人基金会。一般每本书出版时作者还可以申请单独的资助，比如我在出版《多面目莲：明清时期宝卷》的时候，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就帮我申请到了“明代研究学会”(James P. Geiss Foundation)的资助。

**访：**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您认为如何吸引更多的海外学者来研究宝卷这样的中国俗文学？

**白若思：**我觉得需要做好三点：继续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多出版俗文学、口头文学整理本、影印本；继续加大俗文学的外译和研究。当然，在对外宣传时必须明确中国俗文学的重要性和文化特点。

**访：**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希望您未来以更多的学术成果惠及国内外从事中国宝卷和俗文学研究的学者。

**白若思：**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也祝愿你在上海生活、学习愉快！

(本文系陇东学院博士基金项目“中国宝卷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研究”之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XYBY202019，采访人单位：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

### 注释：

\*鸣谢：本篇访谈内容得到白若思博士的多次审阅和修改，特此致谢。